

# 中国管理学者如何实现学术创业？

## ——读彭维刚教授文章的体会

□ 谢 恩<sup>①</sup>

**摘 要：**中国管理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异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呼唤中国管理学者加快推动学术创业。笔者围绕彭维刚教授在构建制度基础理论的历程中总结出的学术创业经验阐述了自己得到的启发：在差异性与传承之间保持平衡是理论差异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根植于中国情境同时兼顾普适意义是研究的灵感之源，深入了解理论流派的范式和特征是东西方理论整合的前提，与国内外学者展开实质性合作则是调动优质资源的有效途径。笔者还结合彭教授指导论文写作的亲身经历强调了研究人员应从细微之处提升管理研究的规范性。本文对彭教授思想所做的理解与阐发不仅对学术创业有所裨益，对青年学者进行学术创新亦有帮助。

**关键词：**学术创业；战略的制度基础观；合法性构建

### 一、中国管理学者需要推进学术创业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与此对应，中国企业不仅在西方企业长期占据优势的领域逐步取得了竞争优势，同时也在新经济领域抢占了发展前沿。中国高铁、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被誉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新的四大发明。作为来自新兴国家的经济力量，中国企业在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成功创业，为中国经济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似乎并未与中国企业实现同步创业。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在高水平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大部分的发表可以归结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利用非中国情景对于传统西方管理理论和模型框架进行

---

<sup>①</sup> 谢恩 (E-mail: Xieen@tongji.edu.cn)，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检验或修正，第二类是利用中国数据与情景对于传统西方管理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和发展。鲜有研究能够真正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实现理论突破。整体上看，当今的管理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的（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

如果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当中的成功创业，仅仅是复制了西方企业实践，那么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如何建立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然而，中国企业的发展，的确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企业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以战略管理实践为例，中国企业发展与成长，是在我国特有的“政府—市场”双元驱动的制度框架下取得的，呈现出了许多新的成长战略。从彭维刚教授最早提出的基于关系的战略（Peng & Heath, 1996），到近期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中国企业对于政治联系的构建与利用（Sun et al., 2016），都是中国企业在制度转型时期特殊的成长战略。在企业的国际扩张方面，我国企业也并非像西方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是从发挥自身优势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出发开展国际化的。陆亚东教授提出的“跳板理论”（Luo & Tung, 2007），Witt 和 Lewin（2007）等学者提出所谓的“逃离理论”，认为中国企业热衷于对外拓展的原因之一，是试图从中国不完全的制度环境中“逃离”。

以上有限的几个例子已经凸显了中国企业所开展的管理实践与西方传统理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基于中国实践构建和传播新的管理理论，就成为我国当代管理学者重要的任务和历史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发展环境；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已经跃居全球前列。为世界各国，特别

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中国方案，既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也是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的需要。彭维刚教授作为杰出的华人学者，所倡导的基于制度的战略管理理论，能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产业学派、90 年代资源学派轮流占据主导地位的战略管理研究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战略管理、特别是新兴国家战略管理的主流理论，他的经验和心得非常值得我国管理学者在学术创业的征程中学习借鉴。作为彭维刚教授长期指导和帮助的青年研究人员，我们有机会率先拜读了彭教授为《管理学季刊》撰写的学术创业的论文，也很荣幸地受到彭教授和编辑部老师的委托写一篇评论性的文章。以下简单地谈几点我从彭教授文章（彭维刚，2018）当中所得到的、关于如何推动中国管理学者实现学术创业的认识。

## 二、把握好差异与传承的关系

当今的中国，已经到了认真思考如何从“向全世界贡献产品”向“如何向全世界贡献思想与解决方案”的临界点。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崛起，海外学者也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实践能够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Buckley et al., 2018; Hoskisson et al., 2013），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运气和中国特殊的国家条件所造就的。例如，著名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曾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低成本劳动力加庞大的市场（大前研一，2015）。如果我们中国管理学者不能把中国企业发展故事讲好，不能有效地传播中国的管理理论，那么在下一

阶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所能做的贡献将十分有限。

让听众接受源自中国的管理理论和观点,核心是建立中国管理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彭教授结合自身开展研究活动的心路历程,指出处理好差异—传承之间的关系是构建新的理论流派合法性的关键。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及目前所取得的辉煌发展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学者构建管理理论中的“中国学派”的愿望和信心。这一目标本身显然是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如果不能获得广泛的合法性,这些研究成果是很难引起国际管理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同的。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过去“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也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由于缺乏合法性,很难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彭教授构建“基于制度的战略管理理论”的过程,揭示了在学术创业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并不断调整差异与传承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学术创业的关键。彭教授的心得是,差异化要在传承和创新两方面都出彩。差异太小会被认为缺乏新意,而差异太大,则会被已经在这些领域成名的学者所质疑、排斥,甚至是封杀。事实上,在构建基于制度的战略理论时,彭教授并非从一开始就提出“制度基础观”。从彭教授1992年博士课程论文到2002年《亚太管理期

刊》(*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APJM)刊出了彭教授第一篇以“制度基础观”为标题的文章(Peng, 2002),这十年间,他始终没有使用“制度基础观”的字眼。从首次在APJM上提出“制度基础观”之后又过了六七年,彭教授才在两本主要期刊上公开提出“制度基础观”(Peng et al., 2008, 2009)。

彭教授循序渐进地构建新理论合法性的过程,实际上与制度理论关于构建合法性的动态模型的预言是一致的(Navis & Glynn, 2010)。根据这一模型,构建新事物的合法性,不仅存在最优独特性(optimal distinctiveness)的概念,同时最优独特性的水准会随着新事物所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不同而不同。在新的事物产生的初期,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事物与现有的事物的共同性与联系,从而使得“听众”(audience)能够通过归类法<sup>①</sup>接受这些新的事物。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过度地强调自身的独特性(distinctiveness),会将新的事物暴露在制度压力之下,导致其生存下来的机会大大减小。当新的事物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了解了它的特征,这时再强调自身的独特之处对于构建合法性则是有帮助的。

结合彭教授构建“制度基础观”的策略以及制度理论的观点,中国学者在学术创业当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差异与传承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针对中国的现象,完全不去借鉴之前的理论基础,并且采用与海外学者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最后得出一个与现有理论框架不相容的

① 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人们往往在心智中将所接触的事物归为若干个类别。在新的事物出现时,人们首先试图将其归于已经存在的分类体系中的某一类,进而通过理解其特征达到认识新事物的目标。

成果，那么构建新理论合法性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了。在中国管理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如何看待管理学术研究规范的西方化。有学者认为这样的一种变化使得中国学者可以在一套语言体系下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也有学者则质疑甚至批评这样的一种转变，认为这些承袭西方研究方式的中国研究，完全没有揭示中国管理实践的精髓和复杂性，而是将丰富的中国实践刻意地装填进入西方的理论框架（关于这些争论的介绍可参考：梅刚，2011；韩巍，2014；徐淑英和吕力，2015；席西民和韩巍，2010）。从通过恰当把握“差异—传承”构建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学者在学术创业过程中完全不考虑既有研究的规范和方法，从一开始只强调差异性，将很难推动所开展的研究获得更加广泛的合法性。

### 三、把握好普适性与中国特色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学术创业中还需要把握好普适性和中国特色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及企业的快速成长，确实为中国管理学者开展学术工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对象。许多中国学者都将观察、提炼、构建、推广面向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作为自己学术贡献的终极目标。这样的“家国情怀”固然值得鼓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有“面向”本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开展学术研究的愿望。如果中国管理学者在国际上所传播的研究成果，仅仅聚焦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完全无法推广至更加丰富的国家制度环境，则

这些研究成果很难引起海外学者的共鸣和关注，将限制中国学者为管理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潜力（Barney & Zhang, 2009；梁觉，2011）。

彭维刚教授的学术经历为如何破解这个问题，即如何把握所做的研究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彭教授开展学术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就是他经常是首先从发表高水平的理论性文章开始推动研究工作。他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刊登管理学理论性文章最高水平的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上。彭教授当时关注的也是中国现象。针对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快速成长，开始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有兴趣。彭教授敏锐地识别了一个研究问题，即中国企业是如何实现成长的？实际上，经济的成长，正是无数企业在一起成长，最后加总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某个百分点。因此，分析中国企业的成长问题，显然是一个前沿性的学术问题。

退回那个年代，一定有许多中国学者有类似的愿望分析中国企业的成长问题。但是，彭教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了这样的学术愿望之后，并非马上提笔写作，而是对已经发表的类似研究进行了仔细地检索，结果发现只有董林雪英（Rosalie L Tung）发表过一篇《中国企业的激励模式》（Tung, 1981）。很多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一旦检索发现类似的研究发表很少，就判断自己的选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其实，此时更应当保持的态度是谨慎，因为很少有人选择的题目可能缺乏价值，或者难以引起其他学者的共鸣（陈晓萍等，2008）。实际上，彭教授的确发现这篇文章的引用量很少，

所以担心只写中国问题的文章难以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和关注。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将中国企业的成长问题引入管理学研究的主流？彭教授在实现这个目标时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其中最具创意的做法是把苏联东欧国家的企业与中国企业放在一起，从而使得研究的普适性大大提高。为此，彭教授专门把管理学、中国研究和苏联东欧研究三方面的文献都系统地学习了一遍，想到一些别人不注意或没想到的问题。在他所做的工作之前，中国研究的学者只看有关中国的文献，苏联东欧研究的学者只看有关苏联东欧的文献，几乎没有什么交集。Peng 和 Heath (1996) 发表后，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之一是这篇文章不是仅仅涉及了一国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管理问题，而是涉及了从波兰横跨欧亚直到越南等数十个转型经济体当中的企业成长共同面临的战略问题。

当下的中国管理学者所面对的环境，比彭教授当时要优越得多，突出地体现在国际管理学界对于中国的兴趣空前高涨，我们已经不需要花费多少笔墨向评阅人、编辑和读者解释研究中国问题的价值。但是，单单去发掘那些专属于中国，但对于其他国家缺乏指导意义的管理问题和规律，也很难引起国际同行关注。笔者博士毕业不久，一篇在导师指导下所写的文章很幸运地得到了彭老师的青睐（Li et al., 2010）。他的加入显著地提升了论文的质量。在向彭教授请教的过程中，笔者曾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强调这是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彭教授的回答，那就是研究

采用的数据和实证情景可以是中国的，但是所产生的贡献和意义应当是具有普适性的。今日读了彭教授关于学术创业的论文，才明白当时这个回答是基于他多年的研究积淀所得到的感悟。

## 四、把握好国际管理研究界的理论流派

尽管更多地发表顶级管理期刊论文并非是判断学术创业成功的唯一标准，但是成功的学术创业必然体现为更多基于中国情景的理论发现发表在顶尖期刊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管理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中国学者撰写论文向高水平期刊投稿，应当深入了解相关领域已有的理论流派和特征。这是因为学术论文发表是一个同行评议的过程，编辑在收到投稿之后，会将稿件送给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阅。如果投出去的文章对于领域内的理论流派的特征不熟悉不了解，则论文不仅不能得到发表，甚至会受到评阅人严厉的批评。

彭维刚教授和陆亚东（Yadong Luo）教授合作的关于管理者联系的经典文章的发表过程，深刻地表明了熟悉掌握相关流派及其特点的重要性（Peng & Luo, 2000）。尽管该文自发表以来被广为引用，且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是整个发表过程也充满了波折。这篇论文的题目最开始选择的词汇是“managerial networks”，结果这篇文章就被编辑送到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学者手中。对于这些学者而言，网络研究必须要有网络相关变量，如结构洞、中

心度等。但是，彭老师和陆老师的文章恰好没有用到这些经典的网络变量，导致评阅人从题目开始批判这项研究，认为他们在“冒充”网络研究。采用调研（survey）数据的同人都知道，问卷一旦发放，就很难有机会增补数据。幸亏两位教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直接承认这项研究不是网络研究，同时将关键术语改为“经理关系”（managerial ties），这才使这项重要的研究最终得以发表。

笔者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自认为投出的文章很有创新性，但是评阅人常常会问这些文章到底属于哪个领域，作者希望对哪个流派的文献做贡献。彭教授在文章中所举的这个例子，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总体上看，中国管理学者进入国际学术界属于后发力量，所以在实现学术创业的过程中，需要尊重之前的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形成的智慧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中国学者急切地盼望构建面向中国管理实践的新理论新框架，忽视了对于之前已有研究的梳理，也不将之前的成果视为自己所开展工作的基础，而是片面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殊不知这样会使得自己的研究成为海外学者眼中的异类或“四不像”，是很不利于我们实现学术创业的。

## 五、与海内外学者广泛合作， 共同实现学术创业

在彭教授的文章当中，提出了实现学术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调动资源。这里首先需要调动的资源当然是管理学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理论，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和

其他学者的合作。彭维刚教授在回顾自己二十多年的学术历程时，特别强调了与不同层次的学者进行合作的重要性。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国内的管理学者可以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开展访学等多种途径与同行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国内学者之间，由于语言无障碍、教育背景相似，以及地理位置相近，实现实质性的合作往往方便。但是，也有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与海外学者开展实质性合作时往往会有一些困难。笔者对此有一点体会供国内的同事参考，就是要事先准备一个基本成型的论文，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很多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进行交流时，往往停留在观点的交换上，结果双方交流了多次也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合作。如果国内学者可以拿一篇基本成型的论文请海外学者提建议，那么海外学者就能够比较完整地看到研究的构思、在文献中的定位、假设发展的深度、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的规范性，以及实证分析是否发现了有趣的现象。这时，他们就能够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了。如果得到的反馈确实比较积极，国内学者则可以顺势邀请海外学者加入进来，这样双方就能够开始初步的合作了。如果评价并不特别高，我们也能够通过比较具体的讨论了解到如何提升这篇文章，以及未来在构思新的研究项目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通过这样的循环过程，就能够逐步地提高自己构建研究模型的能力。

## 六、从细微之处规范研究工作， 推动中国学者的学术创业

老子的道德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天下

大事，必作于细”。意思是大的事情，都是从细小的地方做起的。中国管理学者实现学术创业，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增加中国在管理领域话语权的大事。但是这样的大事也要从小处着手。彭教授高屋建瓴，构建了四个要素的学术创业框架，但是从笔者自身向彭教授学习的过程中，切实地体会到了从小处做起提升论文整体规范程度的重要性。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彭教授在文章当中列举了很多学者的名字。然而通篇文章当中，这些名字的排列方式都是一样的，即按照首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笔者第一次和彭教授合作，文章初稿写完了以后信心满满地发给彭教授审阅，结果被彭教授严厉地指出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是什么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参考文献的排列，以及作者的名字拼写方面的错误。这些问题在很多中国学者眼中都是小毛病，殊不知这些问题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些错误会大大地增加论文被“枪毙”的概率，因为评阅人会认为你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非常不认真，自然会对你的文章更加挑剔。另一方面，这些错误会使海外合作者不得不花费精力修正这些低级错误，因此不能更好地帮助你提升论文的质量。

笔者曾经与多位在高水平期刊担任编辑的海外华人学者交流，他们指出中国学者在投稿海外期刊时经常出现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不规范瑕疵。例如，表格当中的数据经常对不齐，这使得整个文档的质量看起来很低。还有就是，一篇文章中许多术语前后不一致。国际期刊的评阅人对于这一点特别感到困惑。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究“大而化之”，所以在撰写中文论文时，会为了避免行文的枯燥和单调，对同一个

概念会交替地使用几个称呼。但是在西方学者看来，他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些不同的术语，因此在评阅意见当中往往会质疑论文使用的概念太多。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但是这些看似细微的地方都做不好，确实会影响论文的发表，从而阻碍我们中国学者学术观点的传播。

## 七、结束语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要求中国的管理学者从中国企业管理的丰富实践当中发现新规律，构建新理论，推动中国学派在国际管理学界获得更大的影响。彭维刚教授结合自己二十多年来如何从制度理论出发构建新的、对于新兴经济企业更具指导意义的制度基础观的过程，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实现学术创业的四要素框架，包括灵感、资源、差异和整合。作为彭教授长期关心并悉心指导的青年教师，笔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于彭教授所提出框架的一些认识。其中“处理好差异和传承的关系”是笔者对“差异”这一要素的理解；“综合把握普适性和中国特色”则是灵感产生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与国内外学者进行广泛合作”能够实现资源调动，“把握好国际管理研究界的理论流派”则是开展理论整合、推动学术创业的基础。笔者最后还建议关注细节，形成开展学术研究的好习惯。彭教授在文中以其多年的亲身经历高度概括了有关学术创业的实践经验，而众多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中可能还达不到学术创业这一层次，更多的是着眼于学术创新。通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彭教授有

关学术创业的一整套方法论同样可以为青年学者的学术创新提供指导与启迪,学术创业也正是由不断的学术创新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理论体系并取得广泛认同的过程。笔者受彭教授指点多年,奈何资质有限,对彭教授的学术思想的理解还非常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彭教授和各位读者包涵。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时间:2018 年 2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 参考文献

- [1]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 大前研一:《品质国家战略》,中信出版社,2015。
- [3] 韩巍:《哲学何以在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视角》,《管理学报》,2014 年第 6 期。
- [4] 梁觉:《中西方管理研究的整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 [5] 梅刚:《中国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 [6] 彭维刚:《制度转型、企业成长和制度基础观》,《管理学季刊》,2018 年第 1 期。
- [7] 徐淑英、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 [8] 徐淑英、吕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徐淑英的访谈》,《管理学报》,2015 年第 3 期。
- [9] 席西民、韩巍:《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

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 [10] Barney, J. B., & Zhang, S. 2009.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 15-28.
- [11] Buckley, P. J., Clegg, J. L., Voss, H., Cross, A. R., Liu, X., & Zheng, P. 2018. A retrospective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4-23.
- [12] Hoskisson, R. E., Wright, M., Filatotchev, I., & Peng, M. W. 2013. Emerging multinationals from mid-range economi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s and factor marke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0, 1295-1321.
- [13] Li, Y., Xie, E., Teo, H., & Peng, M. W. 2010. Formal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8 (4), 333-344.
- [14] Luo, Y. D., & Tung, R. L. 2007.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81-498.
- [15] Navis, C., & Glynn, M. 2010. How new market categories emerge: Temporal dynamics of legitimacy,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atellite radio, 1990 - 200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5, 439-471.
- [16] Peng, M. W. 2002. Towards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 251-267.
- [17] Peng, M. W., & Heath, P. S. 1996.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492–528.

[18] Peng, M. W., & Luo, Y. D. 2000.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486–501.

[19] 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 Chen, H. 2009.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3, 63–81.

[20] Peng, M. W., Wang, D. Y. L., & Jiang, L. 2008.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920–936.

[21] Sun, P., Hu, H., & Hillman, A. 2016. The dark side of board political capital: Enabling blockholder rent appropri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9, 1801–1822.

[22] Tung, R. L. 1981. Patterns of motivation i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6, 481–489.

[23] Witt, M. A., & Lewin, A. Y. 2007.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escape response to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579–594.